SHANDONG
JIAOYU
TONGSHI

山东教育通史

近现代卷

主编 赵承福

山东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东省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SHANDONG
JIAOYU
TONGSHI

山东教育通史

近现代卷

主编 赵承福
本卷 张书丰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行乞兴学的武训画像



●冯玉祥为“武训97诞辰纪念”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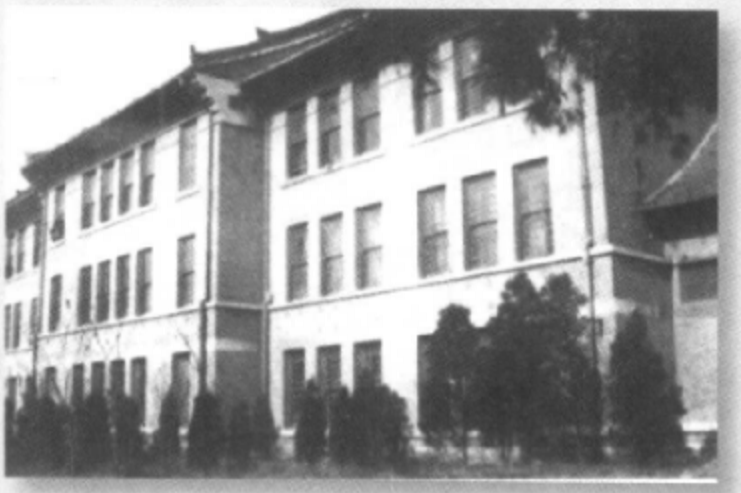
●《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的奏折



●山东巡抚孙宝琦等官员参加共和医道学堂开学典礼(1911年)



● 30年代齐鲁大学校门



●齐鲁大学文学院教学楼



● 王尽美



● 王尽美曾就读的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
邓恩铭与省立第一
中学学生会成员合影
（前排右四为邓恩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国立青岛大学
第一任校长杨振声



● 30年代在山东从事
乡村建设运动
时期的梁漱溟



● 1928–1942年担任
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的
何思源



● 30年代国立山东
大学的科学馆



● 山东著名教育家范明枢



● 范明枢与莒南抗日小学的师生合影



● 抗大一分校的学员在上课



● 抗日根据地妇女识字班在上课



● 抗日小学的学生在学唱歌

前 言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十分丰厚的成果，《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相继出版填补了我国教育史学的空白。尽管以上著作从宏观上理清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层面上对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基本情形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但是，就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而言，以上研究也仅是概括性或轮廓性的。欲观中国教育发展之全豹，就不能不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区域教育进行分阶段的较为详尽的考察。

在中国历史上，山东是少有的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齐鲁”是山东的代名词，“齐鲁文化”是山东特有的区域性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强有力地影响着本地区教育的发展。因此，完成一部山东教育史，不仅能丰富中国教育发展史研究的内涵，而且能对独特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发展规律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本书对山东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正是以这一目的为切入点而展开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作为山东教育发展的历史，首先要考察的无疑是这一历史发展的源头。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当类人猿打制第一块石制器具从而迈入人类社会的门坎时，教育活动就同时产生了。在人类的初始阶段，打制石器、围捕猎物、采摘野果的各种技能技巧无疑是人类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人类进化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教育活动完成的。在远古那些美丽的传说中，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民得以避禽兽虫蛇之害；燧人氏教人“钻燧取火”，民得脱茹毛饮血之苦；伏羲氏教人“结绳而为网罟”，民得获渔猎之利；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耕”，民得享万世之福。以上这四位有创造性的人类共同祖先都以“教”而造福于民，也因而受到后人的尊崇。无论在考古发掘中，还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传说中，山东都是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四五十万年前，“沂源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经过几十万年的斗转星移，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山东的先民们也进入了以陶制品为标志的新石器时期。发现于滕州官桥镇的北辛文化（距今七八千年）、发现于泰安大汶口镇的大汶口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发现于章丘龙山镇的龙山文化（距今四千年）、发现于平度岳石村的岳石文化（距今三千五百年）清楚地揭示着齐鲁先民们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并最终进入阶级社会时期的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齐鲁的先祖先民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改造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演绎着山东的远古文明。这一时期的教育以长者为“师”、能者为

“师”，口耳相传，言传身教，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完全融为一体。

在山东，教育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并逐渐形成区域性特色始于西周。周初实行大封建，周天子的两位重臣——周公姬旦、太公吕望分别被封于鲁、齐。周公旦为鲁国制定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实行礼乐之教的国策。姜太公采取了以“尊贤尚功”为特点的富民、裕民的国策。自此始，齐、鲁两国走了两条不同的国家发展之路。鲁国重德，故以礼乐教于国，以完善的礼仪制度与丰富的典章保存名闻诸侯；齐国尚利，故提倡工、农、商民之间的技艺切磋与传承，以富庶与强盛为诸侯表率。西周时期，天子威重，各大诸侯国都按照统一的要求，设立国学及乡校，实行“六艺”教育。但到春秋战国时，天子势弱，各大诸侯国得以自行其事。因此，春秋与战国是区域文化最终形成的时期。

在齐鲁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创造性的教育活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春秋时期，官学没落，礼崩乐坏，以周天子为权力中心而建立的一整套法规制度被打破，中国进入了重构社会秩序的时期。齐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造就了管（仲）、晏（婴）等名相。管子以富国、强国为目标，实行“四民分业”教育。他把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按类“群萃而州处”，以实现“父兄之教”、“子弟之学”。这种教育，以各自赖以为生的“专业”为内容，取口耳相传（相语以事）、行为示范（相示以功）、技艺观摩（相陈以巧）、切磋竞争（相高以知）的教学模式。其中既体现着国家对教育的严格控制，又带有原始社会“自然教育”的遗风。齐国从这种教育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致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能以富国、强国的姿态雄踞东方。鲁

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孔（丘）、孟（轲）等思想家与教育家。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官学没落的情况下，创办私学，另辟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蹊径。他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学术，制定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实行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的教学方法，培养了数千名学生，造就了几十位学有专长的各类人才。鲁国虽未因孔子而成为军事上的大国、经济上的强国，但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却能以发达的私学教育而成为儒家学术思想传播的中心。

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最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是因了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立而实现的。稷下学宫是兼有官、私学双重特性的教育机构。学宫的教师称“稷下先生”，享有齐国大夫的待遇，除备齐王咨询外以教授弟子、从事学术研究为职责。稷下先生受到齐王的尊重，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正由于此，稷下学宫成了诸子荟萃、百家争鸣的中心。百家争鸣不仅促成了各个学派的发展，更促成了学术思想的融合。毫无疑问，在春秋与战国时期，山东是学术中心，也是教育中心；齐鲁文化既是教育的结晶，也对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二

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对人才的培养实现的。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孔子的学术思想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弘扬。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的许多学生及其信奉者都沿着孔子的足迹，走上了教学岗位。子夏到西河教书，为魏文侯师，田子方、段干木、李悝等皆出其门下；以“吾日三省吾身”著名的曾参，教授70余名学生，子思及著名军事家吴起

都是他的弟子；孟子称自己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周游列国，以儒术游说诸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荀子出于儒门，融合百家，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游于稷下学宫，被尊“最为老师”，不仅汉初诸儒多出其门下，连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是他的学生。进入战国后，齐国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利用稷下讲坛，与各家辩难争论的黄老道家学派的著名人物像尹文、接子、季真、彭蒙、田骈都是齐国人。齐在当时是最能容纳百家的国度，黄老道家之外，儒家有徐劫、鲁仲连，阴阳家有邹衍、邹奭，名家有田巴，博学家有淳于髡，军事家有孙膑，一派人才济济的景况。这些齐国的著名学者大都设学收徒，如田骈，“资养千钟，徒百人”；淳于髡谢世时，“诸弟子三千人为缞绖”，可见都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战国时期如此众多的学术领袖人物“聚会”齐鲁，不是偶然的，它是管子、孔子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教学管理模式长期延续、发展的结果。

春秋与战国时期齐鲁诸子的学术思想对两汉文教政策的制定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汉代初年，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该项政策的首倡之人曹参曾任齐相九年。相齐时，他向百余名学者请教安国之策，最后接受了黄老道家学派盖公“清静无为”的建议，结果齐地大治。曹参后为汉相国，依然以“清静无为”治国，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因此，曾大行于齐国的黄老道家的学说，一度成为汉代初年的统治思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儒家学术的源头，在于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汉武帝崇儒，置《诗》、《书》、《礼》、《易》、《春秋》五

经八位博士。八人师承，皆导源于孔子所传，而其中的申培公、辕固生、伏生、高堂生、田生、胡母生都是山东的学人。后来，五经发展为十四家，山东仍占了八家。因此，汉代的崇儒对于山东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自东汉始，官学教育系统逐步建立，教育也被纳入统治者统一要求的规范之中。但是直到清代，官学学额一直较少，因此，私学教育始终担当着传承文化和人才培养的主要角色。私学发达，是山东教育的一大特色。东汉时，山东有学识的儒生大都以教书为业。譬如，东海兰陵人王良以《小夏侯尚书》教，“诸生千余人”；薛人曹褒以《庆氏礼》教，“诸生千余人”；临济人牟长以《欧阳尚书》教，门徒“常有千余人，著录（弟子）前后万人”；著名经学大师高密人郑玄，“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足窥当时山东私学教育的盛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之地数易其主，丧乱之时，学者多潜心学问，居家教授。因此，私学教育相对发达。西晋时济南东平人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与其同时代的高密人徐苗为一代“儒宗”，居家收徒，专事教授。此二人皆屡拒“辟”、“征”以教书为乐。北齐时东平人张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这一时期，动乱的社会，颠沛流离的生活，引起许多学者的思考。祖籍山东琅邪的颜之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蕴含着深刻教育原理的名作——《颜氏家训》。该书树立了我国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典范。

书院产生于唐末宋初，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式。早在唐末，山东临朐就有李公书院的设立。宋代，山东设有5所书院，其中以泰山书院影响最大，其创办人孙复、石介与胡瑗并

称“宋初三先生”。在泰山书院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泰山学派，对宋代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另外，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也是在楚丘（山东曹县）人戚同文讲学的基础上设立的。自宋至清，山东先后设立过300余所书院，清末仍在发挥作用的尚有200余所。

官学、书院之外，大量存在的起“基础教育”作用的是各类“学塾”。这些学塾从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入手，逐步深入到四书、五经。明清两代学塾之数难于确考，但从1917年时山东仍设有15000余处私塾的情况看，① 这些民间自主设立的教育机构在山东是广泛存在的。

毋庸讳言，封建统治者举办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实施思想控制，因此，孟子制定的“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被贯穿于封建教育的始终。尤其明清两朝，八股文的流行更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我们在梳理山东教育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封建政体对教育的严重束缚。清人龚自珍所描绘的那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景况在山东是严重存在的。换一句话说，封建政体的腐朽在教育上被反映得淋漓尽致。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仍延续了70余年，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屈辱的一段历史时期。山东进入近代社会后封建教育仍延续了60年。在此期间，各类教育除培养出了500余名饱读经书的进士外，于社会发展，几乎毫无“功

① 林修竹：《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山东省长公署教育科1919年印。

劳”可言。

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从而揭开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清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是迫于无奈，他们在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纳入学校教育内容的同时，厘定了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目的在于使新式教育仍能培养出封建政体的“忠臣”“孝子”。但是，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清统治者能够打开一道“门”，却无法保证教育按照他们设定的目标发展。因为，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是与其民主的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而民主的学术思想又必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为保障。你无法使打开的那一道“门”仅吸纳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而将其学术思想拒之门外，更无法确保接受了民主思想熏陶的知识人才不对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竖起了反清的大旗。在此后两年中，有53名山东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大部分是公费留学生。在此后的数年中，这些首先觉悟了的青年知识分子，先后回到国内。他们以教育为掩护，宣传反清革命，并培养革命骨干，终于促成了辛亥革命期间的“山东独立”。从同盟会在山东进行的教育和革命活动看，本书得出了两点认识：第一，当教育的内涵先于政治发生变革时，教育会生成促进政治变革的社会价值；第二，自清末教育改革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已成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有了独立的人格。五四运动期间，山东知识人士（包括青年学生）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充分证明了以上认识。

自清末教育改革始，山东逐步建立起了现代教育体制。尽管这一体制的发展是缓慢的，且在许多方面与落后的社会经济

存在严重的不协调（表现为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离），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山东已拥有了1所全国著名的大学、150所中等教育学校和4万余所小学，并拥有190多万在校学生的情况看，应当肯定，教育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在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经历了国防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教育改革三个阶段。最多时，民主政府除举办着45所中学、3万余所小学，拥有170多万在校生外，还领导了数百万农民群众的学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教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及在教育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四

本书是一部较为全面地研究山东教育历史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梳理”与“解剖”两种方式。所谓梳理，是从发展的角度分阶段地理清山东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全面地展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山东教育的整体状况；所谓解剖，是对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与人物，作较为详尽的阐释。

本书分为古代、近现代两卷。古代教育虽然跨越了两千多个春秋，但其发展脉络是很清晰的。因此，古代卷着重阐述教育在形成和传承齐鲁文化中的作用；近现代教育尽管只有百把十年，但却处在中国社会几经嬗变的时代，因此，近现代卷重在阐述山东教育工作者在一系列政治变革中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过程。在对山东教育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强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